

论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中的“凝聚化”倾向

熊亚菲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作为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家之一,蒋光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以“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确立其个人特色与地位,而其在革命理论上的具体内容则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诠释,被遮蔽在左翼主流批评话语之下。与风格鲜明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相比,蒋光慈的文艺批评似乎显得缺乏新意,多为对苏联拉普文论的机械照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为数不多的文论中仔细挖掘出属于蒋光慈个人的独特理解。只有立足于蒋光慈所处特定历史语境并充分地考察他对“革命”的个人化的理解,我们才能完整、鲜活地把握蒋光慈及其创作和批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他的“革命”概念具有着形而上的特质,是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并混杂其他概念蕴含的集合体。

关键词: 蒋光慈; 革命文学; 凝聚化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2-0073-06

The Aggregating Tendency of JIANG Guang - ci's Literary Theory

XIONG Yaf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revolutionary writers JIANG Guang - ci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his novel writing of “revolution plus lov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owever,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his revolutionary theory, sheltered under the left - wing mainstream criticism discourse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nterpreted for a long time. Compared with his novels of “revolutionary love affair”, JIANG Guang - ci's literary criticism lacks adequate achievements and is short of new conceptions, mechanically copying Soviet Rapp's literary theory. However, JIANG Guang - ci's individual and characteristic reading can be found in her few literary criticisms. Only by a full investigation of his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 of “revolution”, can we understand JIANG Guang - ci and a series of contexts he involved in, and we can recognize that his “revolutionary” concept has a metaphysical quality, being a combination with inherent identity and other concepts.

Key words: JIANG Guangci;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ggregating

一、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研究现状

蒋光慈从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文坛开始,就是一名充满争议性的作家。这不仅在于他身上的革命作家的标签在当时的文坛还尚属新鲜,更在于他进入文坛的方式就带着某种攻击性。他发起创办的太阳社和创造社一起,以批评五四作家“死去了”为自己重要的立足点,引人瞩目地以“普罗文学先锋”的姿态登上中国现代文坛,并在此后左翼阵营的争斗中以鲜明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受到高度关注。但是,学

收稿日期:2014-03-17

作者简介:熊亚菲(1986-),女,江西南昌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术史和批评史上,对蒋光慈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特点:即以具体作品的批评居多,系统的研究论述甚少。这个特点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即已见出,以围绕在蒋光慈身边的一系列文艺批评为例,这些批评大多针对蒋光慈的某一部或者某几部作品,论述也多属于时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语境,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创作和理论的完整研究。

以钱杏邨为代表的太阳社社员,在“革命文学”前期积极鼓吹蒋光慈为先进的革命作家,是民众所需要的一个重要诗人,他是青年崇拜的一个作家。并认为攻击是苏联作家别德内依受排挤的重演,蒋光慈成为文坛“个人主义”排挤下的“文艺的零余者”。钱杏邨认为,对蒋光慈作品技巧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有人全用标语口号作诗,这也是劳动阶级革命初期文艺应有的现象,无足怪的”,更进一步说,“用极优美的句子来写极粗暴的生活这是可能的么?”因此,以最初倡导“革命文学”登上文坛,以实际创作中“思想始终是站在时代前面”为特点的蒋光慈,被文坛攻击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者只能是一种“卑鄙的作家”^[1]的行为。但是 30 年代以后,钱杏邨逐渐转移了方向,不但认同了其他作家之前对蒋光慈的诸多批评,更提出蒋光慈在创作上“才子佳人”的严重问题。

上个世纪 80 年代至今,蒋光慈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蒋光慈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再研究。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在革命中写爱情,能使爱情带上了特定的时代特色,亦使雄伟崇高的革命题材具备了婉约阴柔之美,作品的风格显得刚柔并济,同时具备了多重的审美意蕴”。^[2]有的研究者提出蒋的恋爱小说是“将革命意识与情爱力比多很好地结合起来”^[3]的范例。

二、对蒋光慈受到左翼批判和后期脱党事件问题的再研究,同时与其作品中曾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联系起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反思蒋光慈的个体性与革命的集体主义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其在文本中的反应,认为“这些从五四过来的小资产阶级创造社内部及其他左翼作家对蒋光慈的批评和知识分子同他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非敌对的,却又常常处于一种互相驳难的紧张态势之下”。^[4]因此,蒋光慈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一系列青年革命者形象,被认为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知识分子群像的代表,是在革命话语的遮蔽下知识分子部分显现出真实的珍贵标本和值得研究的对象。

但是,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着局限性,问题如下:

一、深受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批判的影响,以扩大和详述左翼对蒋光慈批评的相关概念为主要方法,在此基础上并未有新的论述和论点出现。

二、以蒋光慈与左翼的决裂为主要研究层面,主要围绕知识分子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论点基本重复。

三、在研究的过程中,甚少把蒋光慈的文学理论与其文学著作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观照,鲜见对蒋光慈进行全面系统作家论研究。

四、对蒋光慈革命理论的再探讨仍偏于简单化,缺乏必要的语境意识,对蒋光慈的革命意识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蒋光慈的文学理论一直处在被部分忽视的状态,这一方面与他的文论内容基本与苏俄正统革命文学论相同,并无太多有系统的个人新论有关;另一方面,蒋光慈对俄苏文论全盘接受,但其自身却没有成熟的理论形态作为内在的支撑,这使得他的文论中极容易出现概念的混淆和“拼盘”的嫌疑。但是,在蒋光慈本人与俄苏革命文学论出现差异的地方,往往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其个人化和独特性的起点。那就是蒋光慈如何理解“革命”的具体内涵。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贯穿蒋光慈理论建构的始终,是蒋光慈研究的一个学术突破口,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革命”的内在“凝聚化”

蒋光慈对于“革命”的理解是贯穿在他的文艺批评始终的。作为最早期“普罗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最看重的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体现“革命”。因此,他的大部分关于“革命”的理解其实都是从他对于现代文坛的文艺批评中开始并体现出来的。

(一) 词汇混用和语义的凝聚

在他的文论中,我们发现一个十分醒目的特点,那就是蒋光慈在使用一些关键概念时出现了十分频

繁的词汇混用情况:

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倘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碍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5]

在这样一个近似于排比句的段落中,我们发现,蒋光慈的陈述几近同义反复,始终只在表达同一个意思,那就是段落开头的“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由此句出发,“个人”只有“认明”、“适应”或者“执行”几种行为,而不能“转移”、“妨碍”和“反背”——这里,个体所面对的客体只有一个,却给予了不同的表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道路”——“社会的要求”——“无产阶级的意志”——“历史的轮关”——“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发展”等等。

这并不是蒋光慈的偶然为之,我们可以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中屡屡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代的文学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太落后了,……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专就我们中国来说罢,我们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应有认识的必要。”^[6](“时代”与“社会生活”混用)“拿破仑是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5](“资产阶级的意志”与“时代的要求”混用)“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极热烈的时代。现代中国的文学,照理讲,应当把这种斗争的生活表现出来。”^[6]“历史的命运,革命的浪潮,任谁也不能将它压下去。”^[7](“历史”与“革命”并举)。这里,所谓完全客观的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与一种主观化的“道路”、“要求”、“意志”、“潮流”相指代了,“任何对于‘是什么’的描述都体现着一种态度,即从‘应该是什么’的角度看待它的观点”。^[8]同时,它还与一种相对具体的时空范畴——“时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这些互相指代的词语,它们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蒋光慈详细阐述了“时代”的具体内容:

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在国际上,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之最严酷的压迫下;在国内,军阀与反动的封建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肆行对于劳苦群众的虐待与剥削,同时革命的浪潮日渐飞涨,……这弄得革命的浪花四溅,奇彩横生,开一个各国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局面。在这一种社会生活里面,不但有残酷的压迫,弱者的哀吟,愚者的醉生梦死,怯者的退后,以及种种黑暗的阴影,而且有光荣的奋斗,强者的高歌,勇者的向前,以及一切令人震动的热情,呼声,壮烈的行为。……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极热烈的时代。^[6]

同时,我们看到,小说中的“革命”也有着相对应的特征。在《少年漂泊者》中,对于汪中来说,他一开始面对的,就不是具体经验中的个体,而是被高度抽象化和喻体化了的实体:社会,“万恶的社会”。当他的父亲死亡,便在他心里立刻化为“人间的不幸者”,成为社会罪恶的一般产物而不再具有个体的特征。而汪中则也立刻成为“人世间不幸的代表”,在他不断经历社会黑暗的过程中,他既是一个不断积蓄黑暗压迫的受害者,又是一个以不同姿态敏感地反抗着压迫的复仇者。他身份的不断变化保证了受到的压迫也形态各异,几乎是集中地把农民、城市底层、旧式知识分子、工人和与之相对应的受压迫方式都展现出来,把世界中的所有罪恶都抽象集中为一个“万恶的社会”,并在革命者遭受任何一点挫折时都迅速地把它归拢到这个对象上去,并积极地向其复仇。当这个实体再次在实际世界中以具体形象扩散生发时,往往以“阶级”的形式来涵盖巨大范围的人群。^①

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时代”正是把“革命”图解化后在中国这个戏剧场景下进行的具体铺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无产阶级或劳苦群众各自按照脚本依次进行有条不紊的演出;每个角色既是在“革命”理念下观照中国现实生活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又是“革命”这个封闭的概念既有的内容。

^① 因此,不管是《少年漂泊者》里的汪中还是《短裤党》里的李金贵、邢翠英,我们看到,革命者的杀戮对象都是随机性的,甚至是盲目的。但即使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对象,也能具有表象全部的功能,分有全部本质。因此,在小说中,对敌对阶级只有彻底的杀戮才能清除。

实际生活不但被涂抹上了理论的色彩,而且被本质化和戏剧化了。“革命”变成了既是深藏在历史发展规律中的根本要求,是历史从人类社会关系一开始形成就规定的方向和要求,同时又成为历史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把历史划分为两个具有根本区别(有无阶级、压迫)的时空的最关键的一道鸿沟。换句话说,一种对现时现地革命实践的要求已经与历史的本质相等同了。“革命”即是“社会生活”,是历史的具体化,又是历史的本质化;是一个在时空中具体的点,又是涵盖了整个时空的本质理念。

(二) 革命领袖与阶级意志

在我们之前提出的词语混用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也就是把客观的社会科学规律与充满主观化色彩的“潮流”、“道路”互相混用。其实,这并不是蒋光慈“革命”概念带有主观性的唯一情况。在论述“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时,他表现得更为明显。针对这一议题,他先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而且看似十分矛盾的观点。

在写于1927年的《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中,蒋光慈写到“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托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托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托洛斯基二人的产物。”^[5]也就是说,个人在“革命”面前仅仅只是一个“要求的执行者”和“心理的指导员”,历史并非个人意志的产物。个人只能“认明”、“适应”或者“执行”“革命”,他在“革命”的面前已经萎缩,并且成为一种被动的承受者。

然而,一年之后,在一篇悼念列宁的文章《在伟大的墓之前》,蒋光慈好似针锋相对地给自己曾经的论断提出了另一番观点:“不错,历史不是个人所造成的,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其成功当然不是列宁一个人的力量。说列宁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创造者,似觉有点不妥当。但是,我们要知道,若每个人能澈查历史的进程,顺应群众的心理,代表群众的愿望,则说他即群众,群众即他,有什么不可以呢?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列宁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苏维埃俄罗斯之能产生,是因为劳农的努力,但是列宁是一个总指挥,列宁一身具有劳农的睿智,他能引导劳农到成功的路上去。”^[9]

这里,同样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词语混用:“历史”——“群众”——“列宁”——“革命”——“苏维埃俄罗斯”。同时,“革命”不但与“历史”相等同,还与“群众”相等同。

本来,“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在道义上之所以具有绝对优势,正是因为其负载者是每个历史时段的被压迫阶级,即“群众”,它是此力量的根本来源,也是个体进行理性认知的道德出发点。“群众”被高悬为力量的所有者,历史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把群众从受压迫的地下推向“人类的舞台”,同时,也正是所谓“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这里其实出现了两个主体,“群众”和“历史”,前者创造后者,后者的目的(方向)在于前者。这两种关系中究竟是哪一对主客关系占据根本,始终没有得到作者很好的澄清,乃至终于混合在了一起使用。

不仅如此,“列宁”这样一个个体已经成为诸多词汇幻化集合的“革命”的“化身”。它使得蒋的“革命”论摆脱了之前关于个人与历史之间被动的关系论,把个人的位置放大到了可以代表甚至引领“革命”的地步。“个体”的确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此时的“个体”自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执行某进一步阶级的意志”、“代表群众的愿望”,一旦此环节完成,个体即成为群众——革命力量的所有者——的“集体”和“化身”,也就是说,此“伟大”的个体是从“革命”到“群众”再到“个体”,是历史之力在形式上的再次凝聚化,这种凝聚化却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肉体上。^①

(三) 个体凝聚化的两个步骤及其特点

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又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完成凝聚化的过程呢?首先,当个体接触实际社会生活发生疑问之时,他通过理性能力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开始把眼光从具体的事件转向茫茫宇宙中统摄整个世界的历史推动力。然而在此,个体又从对理念的认识返回了对人的认识,他又开始重新面

^① 个体在肉体上虽然是可消亡的,但由于其精神是世界生命力本源之本源,因此是不死的。这正是蒋光慈大声疾呼“列宁是不死的”的原因所在。

对一个个鲜活的人而非飘渺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个体先于革命实践地(先验地)通过理性认知的方式,了解、明白了历史的潮流、群众要求、群众心理和社会情绪的具体内容,在这里,个体获得的是一种抽象理念。其次,个体在认识了这种抽象理念之后,需要把此种理念往它的“来源”,也即具体社会生活中进行贯彻实践。个体认为自身既是群体的代表,是群体的一种实质的、集中的代表,同时却又是群体的领导者。可以这样说,个体始于对理念的把握,进而返回对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回到了“社会生活”当中。但是后者已经不是感性直观地通过客观观察得到的社会生活景象,而是被理念改造和概括过的,个体即将投入实践行为的世界了。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当个体变成这样的力的凝聚点之时,出现了两个特点。一,因为此个体是从群众中凝聚、集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能“代表”群众,在这里“代表”的意思是等同、取代和高于。二,此个体在取代了“群众”之后反过来可以对其进行统治。这样的权力资格有两方面,一方面个体由于是在“群众”中萃取的,因此他比一般的“群众”更为高级,他对“群众”的管理实际上是“群众”自身进行管理的行为;另一方面,能领受革命的个体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理性能力,在此理性能力的条件下,他能够懂得历史的发展和革命的真理,而这是为一般群众所无法了解的,一般群众所有的,只是最基本的“力”而已。因此,个体在“代表”了“群众”的情况下,是“执行者”,也是“指导员”,他既被此“革命”所束缚,又高于“革命”的盲动之力。他不能改变此“革命之力”的发展方向,却能有效地认识和引导它。在依附于此“革命”的同时,他即获得了、分享了其神性,变得“伟大”起来。因此,蒋光慈不由自主地在文中欢呼到“列宁——大旗的作用在于号召被压迫的群众,做人类解放的象征,规定世界革命的方向。”“列宁本身是人类解放的象征,是世界革命的大旗。”在这里,个体已经突破了之前“革命”所能给予的一系列规定,反而成为了可以“规定”革命方向的人,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但原文中这个“个体”仍旧标明为“列宁”。

那么,只有“列宁”一人,也就是说,只有极个别“革命领袖”能够实现这样的“代表”和“伟大”吗?作为蒋光慈来说,他倾向于否定的答案。^①在他尤为推崇并亲自翻译的小说《一周间》中,他特别提出了其中的一段并做出评论“我们就是革命,我们就是我们在会议场中所称呼的先锋队。……对于他们知识阶级,革命就同个另外的,神圣的东西,要求牺牲的一样,但是对于我,例如……我可以这样地,如哪一个国王所说的一样,国家——这个就是我。”^[4]

这样的思想就连蒋光慈本人也倍感大胆和“骇人听闻”,^②但又由衷地喜爱,并不得不“承认这些话是对的”。它的大胆在于,在“革命”与“个体”的关系中,不仅仅已经把“个体”的能动性和位置抬到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打破了仅仅是领袖才能拥有此代表的资格,而把这样的权利放送给了每一个革命者,试图彻底地把“个体”从“革命”的强压下解放出来,当每一个“个体”都能代表“革命”之时,也就是“革命”的权威、巨大和神秘性的瓦解之时,而这显然是不能够为实际斗争所允许和实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代表”和“象征”革命的个体之外,对于这样的“革命”,个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蒋光慈对于“革命”的力量有着毋庸置疑的确信。对于蒋光慈来说,苏维埃俄罗斯的成功是事实给予他的最好的证明。

(四)“凝聚化”的真正内涵

因此,综上所述,蒋光慈的“革命”有如下几重内涵而互相涵盖,形成了他的“革命”概念独特的“凝聚化”:

第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阶段的客观规律,是人类历史经过高度理性总结后人作为个体得到的科学认知。蒋光慈对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知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它也是一种自然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巨大的集体意志,它是“群众”在财富上长期遭受分配不

^① 蒋光慈并没有指出这样的“人”是否每个个体都有能力做到,但是在《唯》一文中,当他呼吁个体依照此等顺序领受革命时,使用“我们”一词,也就是说,存在这样的可能:他并不否认这样的凝聚点会有一个以上。

^② 原文“这是《一周间》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话,这是何等大胆!这是何等地骇人听闻!”(——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从蒋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种观念震惊的态度。

均而积累的一种反抗的欲望,这种欲望受到“公平正义”的肯定而具有了强大的道德优势,同时因为长期根植于下层群众而必然地粗暴和毁灭一切的特征。(然而由于它的出发点是“公平正义”,目的打倒了手段,因此手段是可以被原谅的,并且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①

第三,革命是历史(规律)发展到现时一种对必然性的社会生活具体化。当个体开始与“革命”建立关系,就分别体现为:个体在理性上对历史的客观规律进行认知;个体在理解和接受此规律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不可避免性或不可违逆性;个体在历史规律的召唤下产生了把一种必然性在当时当地付诸具体化的冲动。但是这一点在蒋光慈那里,仅仅表现为作为作家的宣传,这一点矛盾笔者将另文讨论。

第四,某些个体进行理性认知和社会实践之后,能够成为“革命”的代表,甚至规定“革命”的方向,以至于最后成为“革命”的化身和象征,完全掌控革命而成为高度本质化的个人。它使鲜活的个人经由“革命”这样一个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获得了理论本身包含的力量和道义的合法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蒋光慈的“革命”成一种明显的悖论: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又杂糅了多种不同的语词和语义。这反映了他自身对苏联革命理论尚不能完全辨明,大有囫囵吞枣之势的情况,也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有着把“革命”实体化的趋向。“革命”在蒋光慈的意识中成为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无所不包的而又神秘的宇宙实体,它一方面是科学的,一方面又是具有道德优势的。它以无可阻挡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任何生物都无法逃脱它无处不在的控制。但是它又会以尚不能辨明的方式把自己显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由此成为这种实体精神的代表。这种主体意识的凸显某种程度上似乎使“革命”对个体的压迫得到了缓解。但是,事实上,能够成为“化身”的个体微乎其微,蒋光慈试图把这种资格扩大为每一个所谓“真正的革命者”,但是这种努力毫无疑问会遭到失败。于是,当“革命”从一种社会科学规律蜕变为具有道德合法性的“群众”历史行为以及具象化的“社会生活”时,我们发现,它的下一步指向了具体的个人,从最开始的客观规律最终指向了具体的人(革命领袖),蒋光慈具有同一性质的“革命”最终朝个人崇拜的方向高度凝聚。

1927-1928 年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兴起阶段,文学与政治结盟的初期,作家在文学理论上对“革命”的阐述有两种路向:以蒋光慈和郭沫若为代表,从艺术(准确说来是诗歌)对“实体”的追求来接近革命;以创造社后期四子(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彭康)为代表,从哲学入手来理解革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并行于其中。蒋光慈的文学理论,是其深受苏联白银时代诗歌创作影响(尤其是勃洛克)的结果,不同于第二种路向的哲学性质,这种理论观更贴合文学自身,但疏于严整体系的建立,最终成为一种被彼时忽视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钱杏邨. 蒋光慈与革命文学[A]. 现代中国文学作家[M]. 上海: 泰东书局, 1927.
- [2] 古大勇.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 [3] 方维保. 文学书写的情感祛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隐身[J]. 湖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
- [4] 胡晓利. 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艰难穿行——论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个体性追求[D].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5] 蒋光慈.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J]. 新青年, 1924 (3).
- [6] 蒋光慈. 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J]. 太阳月刊, 1928 (1).
- [7] 蒋光慈.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A]. 俄罗斯文学[M]. 上海: 创造社出版部, 1927.
- [8] [英] 以赛亚·伯林. 马克思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A]. 现实感[M]. 潘荣荣,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9] 蒋光慈. 在伟大的墓前[J]. 新青年, 1925 (4).

(责任编辑: 张立荣)

^① “革命”既是“有理的”, 又是“有力的”。它是被个体通过理性认知到的一种不可违逆的巨大力量。从另一角度来看, 可以说, 这种力量的理性在于它预期要完成的目标是一个有建设性的, 完全达到“公平正义”的社会, 它的心灵(非理性)在于它的狂暴的, 扫除一切的气势; 它的目标的道德优势确保了力量的充沛, 力量的充沛则再次确认了目标实现的可能。